

不一样

□山峰

疫情中的小区“两套班子”

□阿紫

疫情对于我家影响非常直观。妻子睡觉常被打扰,因此也导致我睡眠质量下降。有时凌晨一两点、有时清晨五六点,睡得正香,妻子的手机铃声突然就响了。给她打电话的都是业主,有的咨询外地返回需要什么手续;有的问错过了昨晚的集中核酸检测,还能不能去上班。

“有关最新防疫政策,您应该去问社区网格员……”妻子虽然情绪不太好,但还是会调整好语调、语速,耐心地告诉业主,网格员和物业管家分工不同。

放下电话,妻子很无奈。这两年多来,虽然一再“科普”,但还是有不少业主一再找错人。这些业主大多是中青年,学历也不低,何以理解力这么差?妻子一度怀疑他们是“克莱登大学”毕业的。后来渐渐明白了,他们并非拎不清,而是觉得自己交了物业费,有问题找物业管家天经地义。他们并没有交钱给居委会,觉得老打扰网格员不太好意思。

“可他们都是纳税人,居委会经费来自财政拨款,作为有文化的人,不可能捋不清这个关系吧?”得知了他们的想法,妻子有了新的不解。这个不解,初中毕业的保洁阿姨给她解答了。直接将钱交到你手里,和拐了几个弯到你这儿,感觉总归是不一样的。

“网格员也不容易啊!”已经很久没睡好的妻子,心疼起了网格员。因为那些业主挂了电话,马上就会打给网格员。

其实本该找物业的事,却去找居委会的,也不少。通常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,他们总觉得社区干部是公家的人,靠得住;物业公司是私人老板开的,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
妻子他们和网格员原本没有什么往来,彼此很陌生。两年多抗疫下来,渐渐成了朋友。作为管家,物业公司与业主平日交往并不少,也揽下了不少事。比如每次小区做集中核酸检测,物业和社区人员会积极主动、同心协力一起上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不少居民更加模糊了两者界限,觉得有事找谁都一样。

“既然都这么熟了,你每天向网格员了解一下最新政策,有人打电话问你,你直接告诉人家不就完了?省得吵了两个人的瞌睡。”我向妻子建议。妻子说这是馊主意,别的事可以互相帮忙,涉及政策、规定,必须分清宣讲权、解释权。万一转述出了错,公司肯定要处分她。而且转述最容易因为个人理解差异发生偏差,说不定就耽误了业主的事。

哈哈,对于普通老百姓,小区“两套班子”还是难以分清啊。

不知从哪天起,我注意到了门口捡垃圾的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六十多岁,很脏,更显得破落。有好几次,我从家里出来时,看到那个老人正翻弄着我家的那个大垃圾桶。

下班回家,我和在厨房忙碌着的母亲说起了这事。母亲只是“哦”了一声,很轻描淡写的,像是早就知道了似的。我说:“妈,你知道吗?那个老太太看上去好脏啊。”母亲有些漫不经心:“是吗?我知道了。”我讨了个没趣,也去忙自己的事了。

真是讨厌什么就碰上什么。我出门时,又看到了老太太,还是在翻着那个垃圾桶。我特意在那里多站了几秒,老太太察觉到了身后的人,忙停住,转过头看了我一眼,神情显得有些慌乱。我哼了一声,转身就走了。

那天,我在家休息,母亲打扫房间,理出来一大堆的废旧报纸。看我闲着,母亲指挥我说:“去,把这些废旧报纸都扔外面的垃圾桶去。”我看看那些报纸,起码得有个十几二十斤吧,说:“妈,这扔掉是不是太可惜了,要不卖掉吧。”“也卖不了几个钱,就扔了吧。”我说好吧。印象中,母亲可难得这么大方的啊。

又一天,我下班回家,看到母亲正拿着十几个空塑料桶,直接往垃圾桶

里扔。那些以前都是装牛奶用的。我很诧异地问:“妈,你怎么扔掉了呢,不是说留着卖钱的吗?”母亲是说过的,这桶很硬实,要5毛一个呢。母亲一愣,转而笑了:“哦,瞧我老糊涂的,我是忘了。”

我想起了什么,说:“妈,你不会是想让那个老太太来捡吧?”母亲没说话,没说话就是默认了。

“妈,你想帮她,哪用那么麻烦啊,我有办法。”母亲说:“什么办法?”我笑笑,摸出了十几枚一块钱的硬币,放进一个透明的保鲜袋扎好,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母亲不语。

隔天的一大早,门铃被摁响。母亲去买菜了,不在家。我躺在床上,不想去开,门铃就一直在响。没办法,我只能穿好衣服去开门,竟是那捡垃圾的老太太,手里拿着的,正是被我扔进垃圾桶的那袋硬币。老太太说,这是你们扔错的吧,还给你。我刚想说什么,老太太把那袋硬币放在门口,转身就走了。

母亲买菜回来,听我说了经过,告诉我:“你知道吗?你扔东西和扔钱是不一样的。扔东西是你丢掉的,扔钱是你的施舍。老太太知道,你是故意把那些钱币扔进垃圾桶的。退一步说,即使是我们真的不小心扔错了,老太太也不会拿这钱。”

我是不是不应该小看任何一个人。

和婆婆思想“同步”

□星闪儿

后来小A告诉我们,一进门,婆婆就瞅着她看了半天,尽量委婉地说:“你这打扮在我们这儿不合适,让街坊邻居笑话。”小A一听,立马黑脸,撇嘴道:“妈,我跟你衣品完全一致。但您儿子老嫌弃我土气,还说我才20多岁,看上去和中年大妈一样,我这发型是他领我去发廊做的,这衣服也是他给我买的,我今天故意穿来让您瞧瞧,让您狠狠批评他一顿,看他日后还敢不敢嫌弃我。”

婆婆见儿媳这么乖巧,态度也反转了,说了儿子几句,然后转头劝小A:“嫌你土气是他不对,但你这样一打扮,还真是漂亮了不少。在大城市这样的打扮不算出风头,咱们这儿落后、闲言碎语多,你平时穿穿不要紧,上班还是小心点。”

见婆婆思想上升到了新高度,小A忍不住偷乐。她也悄悄给婆婆买了几身时髦的衣服,让老公送给婆婆,就说是他俩买来孝敬老妈的。婆婆虽然嘴上说穿不出门,但每次去亲戚家喝喜酒都穿上,逢人便吐槽儿子儿媳把她打扮成唱戏的了,其实心里高兴得很。

小A把婆婆打扮成时髦大妈,婆婆的思想也渐渐向她靠拢,小A给婆婆“洗脑”成功。

小A说她不仅在穿衣打扮上用了此计,生活中很多的婆媳分歧,她都会假装和婆婆同步,将矛盾转移到婆婆和老公之间,因为同样一件事情,亲母子处理起来便会容易很多。

我也很有启发,家庭里的事情不要刻板看待,能笑着解决的事情,千万不要加剧矛盾。对婆婆,适当哄哄,难办的事让老公出头,尽量干戈化玉帛。

“大女主”没那么好当

□刘亚华

去年春天,我碰到多年不见的同学艳子,她得知我每天写稿辛苦不说、还挣不到多少钱,于是对我说:“你呀,那么累干什么?挣钱是男人的事,女人是要好好享受生活的。你想想,你这么累,穿也没穿好、吃也没吃好,面膜都舍不得每天贴一张,死了也不值呀。”我看着她光鲜的样子,再瞅瞅自己,黄脸婆一样的惨状,也觉得亏欠了自己。

艳子和我读书时便是好朋友。她懂得保养,舍得给自己花钱,每天除了打牌就是找人闲聊,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我羡慕她,又因为找寻到丢失了多年的朋友而兴奋不已,不由得想跟她亲近几分,艳子也很高兴,推心置腹地和我商量着如何改变。

她首先带我去买衣服,几百上千块一件的衣服,原来我只看看不敢试,但艳子一怂恿,我也装着轻松的样子刷着银行卡,尽管我心里还有点疼钱,面膜、日霜、晚霜、眼霜大瓶小瓶搬回家,还特意在艳子的指导下去美容店办了一张贵宾卡。除了保养外,艳子还教我打麻将、跳舞、泡吧。自从和艳子重逢后,我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开始丰富多彩起来。

这样坚持了半年,我的朋友越来越多、穿衣也越来越像街上人,可我发现灵感渐渐地消失了,下笔生涩,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了。我的银行卡里储备资金越来越少,有时候还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。更要命的是,老公怨我不顾家、孩子怨我不管她。是啊,我好像不是先前那个小女人了,但我好像也并没有变成那种为自己而活的女强人、“大女主”。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,茫然极了。艳子在一帮朋友聚会中,说她成功地把她训练成和她一样懂得享受生活的人,我听着听着,却觉得有些心酸。

我这才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,还是从前安静的、为梦想而写的生活,那时虽然挣不到多少钱,可我平静而满足。

我又每天清早五点起床,码字看书;周末带孩子去图书馆,或是陪老公看场电影,或是一家人做顿美食。这回,我确实确实觉得生活简单而充实、幸福而快乐。最重要的是,我找回了自己在文字中获得的自信。我知道,我在写作这条路上走得很孤单,但哪怕只能看到所向往的彼岸,我走的时候也充满了勇气 and 希望。

这次我亲身体会到了,有些生活并不适合我;过自己喜欢的生活,那才是幸福的源泉。生活中,我们会因为一些诱惑短暂地丢失自己,不要紧,一点一点找回来。